

2003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

JIE DUAN CHENG GUO XUAN BIAN

阶段成果选编

下 册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项目名称: 20 世纪西方文艺批评主潮

项目负责人: 王岳川

项目信誉保证单位: 北京大学

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的意义

研究 20 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对当代中国文论建设有何意义? 通过对其历史脉络的把握和对流派影响的深入研究会对我们有何启发? 这些思潮进入中国后有怎样的文化过滤和文化移植? 这种文化的理论旅行在新世纪中国文论转型中有怎样的意义? 这些都是必须弄清楚的。在我看来, 研究 20 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关键在于, 研究各种西学“主义”时, 力求弄清其思想文化“语境”, 追问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 仅仅是西方的问题还是人类的共同问题? 是国家民族的本土问题还是全球性的问题? 是现代性文论问题还是后现代性文论问题? 这些问题的深入探索, 将有助于新世纪中国文论批评的借鉴和自我反思, 并对我们的文化理论策略和文学理论价值维度的确定有着积极的意义。

进行 20 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 不仅要分析其与 19 世纪文学理论思潮的内在承继关系, 以及其与西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知识社会学、政治学等的关系, 以获得一个比较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工作平台; 而且要进行 20 世纪时代精神的基本分类, 即把握二战以前的“现代性”西方文学理论精神, 进而关注二战以后的整个西学精神的转型, 分析其“后现代性”产生播撒的内在原因、基本形态、价值转向等问题。同时还需审理世纪末在冷战结束后的西方文学中的“后殖民性”——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问题, 并对这一多元文学批评的正负面效应加以阐释。

20 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转型特征, 表征出现代性艺术精神向后现代性审美文化价值偏移的重要趋势。这一研究涉及的流派众多, 人物思想芜杂, 问题面广, 更具有多语种特征, 使研究具有相当的难度。同样, 面对 19 世纪末的“近代”文论批评, 本世纪上半叶的“现代”文论批评, 中后期的“后现代”文论批评, 世纪末的“后殖民”文论批评, 问题出现的周期短, 转型快, 牵涉面大, 特别是在人文科学流派和科学分析流派形成的对峙中, 使当代文论研究问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诸如: 如何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加以整合, 对当代语言学、社会学、美学成果加以吸收的问题; 如何从对西方的译介和摹仿中走出来, 以国内文论研究专家的眼光重新看待和分析 20 世纪西方文论批评中最重要的理论批评, 并以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加以验证, 分析其优劣, 发现其内在的文论精神, 为创立中国当代或新世纪文论流派打下基础的问题意识; 如何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语境, 来审理所面对的现代西方文论, 同时通过现代西方文论的发生发展的研究, 来更新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批评建设和话语言说的方式, 进行价值重建, 上述问题均值得认真审理。

20 世纪是文化解构与重建的时代, 面对神性的坍塌, 人类必得重新认识自己, 而

且任何一个民族和个人均不能逃避这一自我身份重塑的历史节点。20 世纪的文艺不断换新变幻,愈演愈烈,20 世纪文论的不断推演创新、流派迭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这种不断创新求变的背后有何深刻意义?它标明了人类怎样一种处境?它指出诗学的反思担当了何种使命?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不断花样翻新,不断发生话语转型这一事实,值得我们在深处思。事实上,重新审理 20 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具有重要的话语转型和重建意义:

其一,研究当代西方文论是在文化互动中的中西前沿思想对话。这意味着,不应仅从知识论和认识论着手,因为这一研究不是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文论评头论足,相反,从生态美学上看,这种西方文论思想的考察,是中西文论和文化的一场本体论意义上的对话,正是在这种对话中,中西文论的真实意义在当前时间中呈现出来。对当代西方诗学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我们从现代文化的高度看西方文化美学困境和诗学精神的张扬,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看到自己文论和美学还因袭着传统的重负,还未能达到真正的反思。这种文艺理论研究的反思和自省,不是要通过比较来贬扬某一文论,这种诗学对话的目的,在于去更深一层探问人类审美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因而,对西方文论的研究只能以相互启示、相互生发为共同基础。只有去除了自身遮蔽状态,只有将探索人类审美文化的真实意义作为共同的尺度,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在一个新的基点上,达到对西方诗学的深刻洞悉。

其二,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研究不能采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而应采用具体的、发展的观点去分析和研究。我们不应照搬和移植西方文艺理论,而应在与西方文论参照对比中,整理、分析、总结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进而建设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体系。当我们真正把握了 20 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真实意义,真正领悟了当代文论下潜藏的存在本体论意义之时,我们的知识型将有全新的结构。在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深层,涉及到一个远为深邃而且相当重要的问题,即中西文化精神的走向问题:因为,诗学研究不仅涉及到诗意的思维方式(诸如改变思维模式,引进新方法论等),更重要的是人生意义和价值存在的重新确立,是人生审美化(即生命的审美生成)问题。因此,建立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体系,必须首先清楚西方文化和诗学的主要趋势和价值取向。只有真正弄清了西方诗学的“文化灵魂”,同时也认清了我国文艺理论急待鼎新革故的方面,才能取长补短,扬优弃劣。

其三,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色彩和“政治正确”意向中,中国文论界在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化的研究中,注意到后殖民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关系时,往往强调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的“文化拿来”,而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新世纪中国“文化对话”的重要性。这事实上提出了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和文论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问题。在我看来,“全球化”不是一个全球同质化单一化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地尊重差异性的过程——科技一体化、制度并轨化、思想对话化、信仰差异化。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人们已经耳熟能详。近年来正走红西方的思想家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zizek)提出:文明的冲突不是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而是发生在同一文明背景下。在西方,这种观点倍受重视。那么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同一种文明内部是什么原因使它发生重大的断裂和冲突,而且,在全球化中为什么要将尊重差异性看成非此不可的?事实

上,全球化时代是尊重差异性的时代,这一多元化的过程相当漫长。

尽管差异性面临的处境很艰难,但是必须尊重它。我不认为全球化时代全世界所有的语言都消失了,只剩下英语;全世界的所有文化都慢慢被整合了,只剩下西方文化;全世界一切的意识、一切的文明都慢慢的被同质化了,多元的历史终结了。相反,全球化是一个学会尊重差异性的多元化过程,是东方西方共同组成人类性的过程,也是西方中心主义习惯自己成为多元中的一元的的过程。在后殖民语境中,中国学者的批评精神不可或缺,本土学者应从自己的喉咙发声,用自己的方式介入第一世界的话语中心,使得话语成为可以“分享”的,理论成为可“旅行”的,价值标准成为可以“互补”的。处于边缘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文化理论介入和对中心主义的警惕,对于抵制第一世界思想家的文化帝国主义霸权话语,使其得以考虑不同历史文化和社会差异所制约的观念处理全球问题,审理以西方现代性作为全球发展唯一标准或道路的知识狂妄,有着不可缺乏的纠偏功能。全球化时代为中国从“西学东渐”走向“东学西渐”提供了基础。一种东西方知识分子平等对话在多元宽松的文化语境中将成为可能。因此,全球化时代对知识分子不仅意味着要不断创造新的思想,而且要找到新的传播自己新思想的途径。新思想新观念的含量和传播的广度决定学者在“学术文化链”上的位置。那些原创性的思想家生产了一个时代,而其他入却仅仅在消费他们的思想,甚至浅化消泯他们的思想成果。当新时代需要新的阐释时,全球学术话语“文化链”一端的波动,会使得处于另一端的我们措手不及。我们思想的命脉与西方“他者”紧密相关,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现实,也一个急需改变和超越的全球化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现实。

其四,文化转型中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问题价值判断问题。这方面文论界认识的差异很大:有从时间矢量角度分为线性发展的过程,也有从超越层面分为新的就是好的,还有站在前现代立场反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也有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进行同步批判的,等等。可以说,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同时存在着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文化断片和经验杂糅,于是,一方面有着全球化意识中的后现代文化视野与跨文化经验,另一方面又有着在后殖民氛围中的文化身份认同与历史阐释焦虑,同时还存在着全球化文化霸权中的历史记忆和民族寓言问题。这种问题的重叠化,语境的杂糅化,场域的错综化,使得“后学”从文化批评进入政治批评领域,并在解构与建构、时尚与守成、虚无与信仰、悲观与乐观中重新书写自我文化身份,当代性的“文本政治”问题因之得以敞开。这些问题值得从两个角度加以分梳。一是“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主要强调西方后学进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在文化冲突中的具体理论反应,一种多元并存的纳受、抵抗、整合、消融的过程;二是“中国后现代后殖民”,是一种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后学新思维,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学术神经,并成为一种看世界的新角度方法,甚至成为一种新的思想平台或流派。这两个问题有着内在不可分离的联系,又可以看成一个问题的两面,彼此相依,互为因果。后学问题上的“西学东渐”,表明当代中国在哲学思想和文化观念上同世界保持了灵动的联系,并使西方的学院派问题进入中国后,不再是纯理论问题,而成为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问题。对中国而言不是全面植入后现代问题,而是在现代性全面展开中择优而行。因此,对政治层面、经济层面、信息传播层面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差异,当从更高价值理论层面加以分析:应该用一个更高、

更远的视野来看如今同时态呈现在面前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在神性和兽性之间找到人性的基本价值平台。说到底，选择什么样的角度，作出怎样的具有合法性的价值判断，与我们的文化身份和中国立场紧密相关。

其五，文学发展中的文化身份问题。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批判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紧密相关。后殖民主义的引入，使得后现代主义的中心与边缘问题、价值平面问题、反权威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并使中国文论界共时性地遭遇到以下诸多问题：后学研究的阐释中国的焦虑，后现代中的语言学转向及其汉语思想的当代言说方式，后现代哲学与中国哲学审理以及哲学新方向，后现代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关系，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复杂状态，后现代主义与新实用主义、科学主义、女权主义，形而上学的命运与后现代实在论，后现代问题与当代宗教神学思想，后现代主义与文学艺术的危机，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东方后现代问题，当代诗学与后现代审美文化，日常生活与后现代性等等，后现代后殖民与文化保守主义，公共领域与公共舆论关系及其共识性与公共性的丧失，人文精神的困境与价值反思，后殖民语境中的知识分子与精神家园，后殖民主义的发展与中国文化思想的内在矛盾，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对抗性态度，后殖民场域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和批评，后殖民话语叙事碎片与时尚怀旧，后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妖魔化中国与知识的买办化批评等。在一系列彼此缠绕，互相牵连的话语中，中国文论学界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研究，并取得一些不容忽视的成果。面对这种后学大面积的思想消解性活动，在传统价值遭到合法性的困境时，只有通过理论和实践层面的不懈探索，通过后殖民时期知识分子的边缘性思考，在获得自身的个体独立性中，将对知识体系的更新和对学术思想的创新，作为自身存在的理由和中国思想延伸的契机。赛义德认为：“作为知识分子，最困难的是要以自己的作品介入想宣传的事物，而又不僵化为一种体制或为了某系统或方法服务的机制。”^[1]我坚持认为，批判是学术发展的生命，但是如果批判仅仅是将知识消解为零散的碎片，仅仅不断复制自身的“批判话语”，而无视问题本身的深度和广度，就难以出现人类知识的新增长，致使话语批判变成时代知识主流的泡沫。因而，从事真正的思想批判和问题揭示，就是重新创造自我身份，并以自己平实的工作为时代做一个真实注脚，进而成为这个变革的社会肌体中的一种反思性微量元素，或许是对新世纪中国思想知识增长的有意义的工作。

在我看来，在当代文论转型与文化重建中，只能尽可能多地遵守不断超越的“人性”的共同价值和认识，遵循一定的国际艺术审美共识，同时加上通过中国知识分子审理过的中国文化的精华成分，才有可能组成为新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形态和新文艺理论体系。

参 考 文 献

- [1] 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北大出版社 1989 年版
- [2] 胡经之、王岳川主编《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大出版社 1995 年版
- [3] 王岳川著《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大出版社 1992 年版
- [4] 王岳川《后殖民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注 释

- [1] Edward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 London: Vintage, 1994. p. 90.

(作者: 王岳川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项目名称：网络汉语研究

项目负责人：陈保亚

项目信誉保证单位：北京大学

网络文本中的词汇自动识别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类进入了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新事物、新现象层出不穷，反映到语言中就是词汇爆炸，新的词汇大量产生，令人目不暇给。词汇爆炸对人的学习能力和记忆能力都是一个挑战，让人常常产生为潮流所抛弃的感觉，“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太快”。新词汇的大量产生也给正处于蓬勃发展之中的中文信息处理工作带来了难题。改革开放以来，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突飞猛进，在理论和应用方面均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就当前而言，中文信息处理的主流技术仍然是基于词汇的，有的甚至以词汇为本位，将文本流切分成一个个离散的词语就成为第一道难关。在这一背景下，新词汇的大量产生使得难关更难，险关更险，也为我们语言学工作者带来了一项严峻而有价值的课题。

中文信息处理属于自然语言理解，其理想目标是让机器理解自然语言，从而可以实现人工合成语言、人机对话、自动机器翻译等等。但是几十年的中文信息处理的实践表明，以词语切分和标注为起点的信息处理技术面临的一个主要难题就是未登陆词的处理问题，其中最具有挑战性的也就是新生词语的识别与处理问题。

我们应该而且能够较好的处理这一问题。新词语的产生仍然遵循着原有的构词方式，只是由于受语言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一些不活跃的或者新产生的语素在短时间内迅速活跃起来，进入到构词过程之中，一些规则短语以各种方式词汇化，因而才大量产生新词语。经过对大量词语的对比考察，我们发现词语之间在构成方式上存在着规则与不规则的对立，这一对立可以成为我们解决新词语问题的突破口。

我们在考察新词语的时候发现，有些词语的构成是有规则的，而有些词语的构成是没有规则的。比如下面两行字组：

老张、老李、老王、老陈、老刘……

老虎、老鼠、老鹰、老手、老师……

从构词方式上看都是前附加构词，从语法意义上看第1组的“老”含有亲切的意思，第2组的“老”意义几乎完全虚化，因此可以对这两行字组的方式和语法意义做出描写：

第1组：“老”放在单音节姓氏前，语气比较亲切。

第2组：“老”放在指人或动物的名词前，构成名称名词，“老”不表示年岁大。

这种描写能够通过字组的内部构造帮助语言学习者和计算机判定字组的语法意义，但这对自然语言理解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区分规则和不规则的现象，并分别

作出处理。在上面两行字组中,尽管都可以给出构造方式和语法意义的描写,但性质并不一样。第1组的描写可以作为严格的规则来类推,每一个单音节姓氏都可以形成“老X”的格式,无一例外。第2组描写却没有这种严格性,不是所有指人或动物的字前面都可以加“老”。我们把第1组字组称为规则字组。第2组字组称为准规则的字组。很显然,如果能找到这样的规则,对于新词汇的学习无疑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信息处理的角度看,如果我们把“老X”放在单位库(词汇库)中,会大量增加单位库中的记录。类似的情况越多,计算机运行的负担越重。如果我们不把这样一些有规则的字组放在单位库中,而只是在规则库中加一条规则,这样的处理就要经济得多。随着网络的出现,新的字组用法迅速增加,哪些字组需要存放在单位库中,哪些只需要用规则解释,是提高计算机运行效率的迫切问题。从词典的编纂角度看,如果我们把第1组中“老X”这样的规则字组放到词典中,词典会很厚,而且缺乏条理性、简单性;而如果我们只是提取“老+单音节姓氏”这样一条规则,词典的负担就会减轻许多,而且可收到以简驭繁的效果,便于记忆和学习,这样的词典含金量也更高。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设计了一个计算机软件,重点描写新词语产生的规律,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一定的算法实现新词语的自动识别和归类定性工作,力图从理论和应用两个角度较好地解决新词语问题。

这个平台包括四个互动模块:(1)单位库;(2)规则库;(3)自动提取程序;(4)数据库管理程序。它们各自的功能如下所述:

(1)单位库。相当于词汇库,用于存储单字和不能用规则控制的字组(如“人、李、老虎、老鼠、铁路、白菜、学习、德国…”),并标注这些单位的语义信息,比如“李”后面会标注“姓氏”、“德国”后会标注“国家名”等等。这类信息的标注是为了满足规则提取的需要。

(2)规则库。存储字组的组合规则。如“‘老’+单音节姓氏”、“国家名+‘化’”。

(3)自动提取程序。这一模块以单位库和规则库为数据输入进行工作,工作后所产生的结果又成为单位库和规则库的输入数据。它主要包含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是新词识别,它就像个网路猎手,用单位库中的单位匹配网络文本,一旦有匹配不上的字组,就捉拿回来,如果规则库中的规则不能控制这个字组,即初步判定为新词,收入单位库;第二个功能是自动提取句法规则。在发现一定规模的新词后,应用一定的算法从新词中提取可能的规则,通过人工鉴别后即可存入规则库。此时仍不能为规则控制的新词即可存入单位库。

(4)数据库管理程序。此模块为辅助性模块,它的主要功能包括:

A、向单位库输入数据。输入的数据主要是基本句法单位及其标注信息,包括增加新的属性字段。输入方式可以是自动成批输入,也可以是手工输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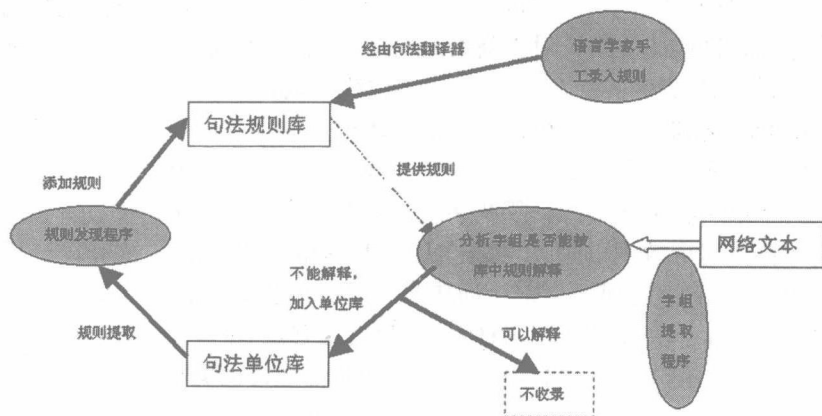
B、向规则库输入规则。规则可以是人工发现的,通过句法规则翻译器进入规则库;也可以是程序自动发现后通过人工鉴别后进入规则库。

C、对单位库进行优化。在发现新规则后对单位库中的数据进行优化,删除可以被规则控制的新词,同时向规则库输入新规则。

D、对规则库进行优化。根据一定的原则合并或者拆分库中的规则,实现规则的数

量与效率的平衡。例如，要是将来双音节乃至多音节的姓氏前面都可以加“老”的话，“老+单音节姓氏”的规则就会上升为“老+姓氏”这样更高一层的规则。

下面是这个计算机平台的工作流程图：



这个平台运转的初始状态是，我们已经有了含有一定数量单位的单位库、含有一定数量的规则的规则库和所需要的自动处理程序和数据库管理程序。初始的单位库所收单位应尽量齐全，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合并现有的语料库，目前有关汉语的语言知识数据库数量已颇为可观，大陆有代表性的即有“现代汉语语义词典”、“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现代汉语语素库”、“现代汉语字词语法知识库”等，此外，香港、新加坡也有一些很好的产品，我们可以充分借鉴和利用这些成果，使之为我所用，同时再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选择和改造。二是人工输入现有词典所收的词。初始规则库里的规则都是人工发现，主要是利用语言学家现有的研究成果，加以形式化。

字组提取程序拿现有单位库中的单位去匹配网络文本中的语料，匹配不成功的字组就会被捉拿归案，收入单位库中。此时，单位库提供单位属性，规则库提供规则，以此来判断被捉拿到的字组是否是能被现有的规则解释。如果可以解释，就不收入到单位库中；如果不能解释，就作为一个新单位收入到单位库中，新词汇的自动识别成功。

举个例子来说，比如下面两组字组所辖实例都很多：

A. 花儿、把儿、心儿……

B. 美国化、德国化、韩国化……

通常把“~儿”和“~化”都看成是后缀，但A组和B组的性质从规则角度看有很大的区别。A组是准规则的，因为我们现在还不能解释哪些字或字组可以出现在“~儿”的位置，而B组在“国家、地区”的语义条件下，都是严格有规则的，只要是表“国家、地区”的字（或字组）都可以出现在“~化”这个位置上，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除此之外的字（或字组）能否出现在“~化”的位置就不一定了。所以我们可以提取“国家名、地区名+‘化’”这样一条规则放在规则库里。如果自动提取程序这个网络猎手从网络文本中捉拿到“韩国化”这个字组，单位库中提供了“韩国”的标注信息“国家名”，而规则库中又提供“国家名+‘化’”这一规则，那么程序就判定

“韩国化”是可控制的规则字组，不收入单位库。如果自动提取程序从网络文本中捉拿到“集团化”这个字组，规则库中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规则，那么“集团化”就会被作为一个新词存储到单位库中。

在整个处理流程中最关键的步骤是判断言语片断能否被句法规则解释，以及如何从积累的尚未找到规则的言语片断中提取规则。至于另外一些技术，例如分词、短语标注等可以利用现有的较成熟的算法。

这个平台不断运转的结果是产生两个不断扩大、优化的库。在文本方面，可以编纂一本包括单位和规则的手册。

这个平台的特色和创新之处何在呢？我们认为，本项研究最主要的特色在于既系统地充分地利用语言学研究成果，又立足于电子计算机强大的自动化处理能力，实现词库和规则库的互动。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我们入手的策略是重点考虑规则和不规则现象的区别，不纠缠于术语和体系的差别。以词和词组的区分为例，由于研究者的体系和标准不同，有不同的结果，比如“美国化”，有人看成是词，也有人看成是词组。关于构词的性质，由于对“化”虚化程度的理解不同，也有分歧，比如“美国化”是附加构词还是复合构词，处理不一样。但从规则和不规则的角度看，在国家、地名后面加“化”是规则行为，认识到这一点对语言习得和自然语言理解与生成是关键。

(2) 系统充分地利用语言学研究成果。我们的研究团队中有一批具备相当中文信息处理知识的语言学工作者，因此，我们可以有系统有目的地考察现有的语言学研究成果，并利用计算机辅助的方法去验证现有的成果，最终将可用的成果形式化，并增添到统一的规则库中。当然语言学数十年传统，积淀深厚，我们只能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这一工作。

(3) 语法规则的自动提取和新词的自动识别。充分利用计算机强大的自动处理能力，实现语法规则的自动提取和新词的自动识别。由于搜集信息的过程是全自动的，在足够的硬件条件下可以由计算机快速、自动、准确地完成信息的收集和初加工的任务，甚至还可以进行信息的深加工。而过去这一部分工作主要依靠人工手动处理，比如要在网络上找某个词的使用情况，目前普遍的做法是：打开浏览器，登陆到某一个搜索引擎，然后敲入关键词，等待结果，搜索者人工地去看结果，找到有用的资料，保存以备以后使用。在这个过程中，计算机只是一个信息的录入、保存和简单计算工具。而我们的软件是全自动的，只要输入一个关键词（当然还可以给出更细致的高级选项），它就会到网络上去找所需要的资料，按照平台规定的标准分门别类地存储，并且给出详细的报告。更重要的是电脑可以连续运转，这样就可以经年累月地进行资料的搜索，既节省了人工，也保证了质量。

(4) 句法规则翻译器。数据库管理程序中包括“句法规则翻译器”的功能。语言学家的研究成果通常能够为机器的自动学习增加更高级的指导，所以这个数据平台打算预留一个“句法规则翻译器”，为语言学家提供便利。通常人们记录他们研究成果的方式是用自然语言，这种表达方式很容易被人们所理解，但却很难被机器所理解，机器能够理解的只是标准化的代码系统。因此我们需要自己设计一套能够让机器理解的标准化指

令系统来记录人工获得的语言学知识，而这个“语言学知识翻译器”正是用来把语言学知识翻译成用统一的元语言表示的规则。

(5) 单位库和规则库的互动。鉴于在单位库和规则库互相独立的情况下，单位库的标注信息要形成规则尚有一定难度，难以得到充分利用，我们在建库过程中保持两库的互动关系，使两者密切配合，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

(6) 密切注意语言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现象。这个平台的不断运转就是对词汇发展动态的跟踪报道，通过大量发现新词并总结新词的产生规律，可以密切关注语言发展的动态，从而使单位库能够适应时代的需要。同时，通过对语法规则的系统化形式化的整理和优化，也可从系统的高度发现语言在语法方面的重要特征和某些新的发展动向。

目前，这个平台正在建设之中，我们已经积累了相当规模的单位库，输入了一定数量的规则。寻找规则，实现形式化，这是语言学和信总处理最好的结合口，我们设计的这个平台是一个尝试，这一目标的实现无论是对对外汉语教学、英汉翻译还是软件的汉化问题都会有很大的帮助。这个平台也是一个窗口，可以从中窥见社会发展的动态，触摸到时代发展的脉搏。

(作者：陈保亚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参加论文写作的
还有宋作艳、邱立坤、陈泽浩、密雪飞)

项目名称：唐诗研究史

项目负责人：孟二冬

项目信誉保证单位：北京大学

唐诗发展的历程及辉煌成就

唐代三百年间的诗歌，自身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按照传统的习惯，我们把它划分为初、盛、中、晚四个阶段。这里，我们就唐代不同时期的诗歌发展状况，略作概要性的介绍，以窥唐诗成就之辉煌。

初唐诗歌 从高祖武德元年（618）到玄宗开元初年（713），为初唐，大约是一百年的历史。初唐诗歌发展的中心问题是：批判地继承六朝文学，融合南北诗风，为唐代诗歌开辟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初唐诗歌是沿着三条路线发展的：（一）突破六朝诗歌的狭窄题材，使诗歌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和重大的政治问题；（二）摒弃轻浮绮靡的诗风，建立刚健有力的新诗风；（三）确立律体，发展七言歌行。初唐的一百年，只是唐诗繁荣的准备时期，它的发展是相当缓慢的。就总的趋势而言，这一时期的诗歌，并没有随着安定繁荣的社会局面而迅速转变，梁陈浮艳之风依然笼罩着诗坛。

初唐前五十年间的诗人，大多是由陈、隋入唐的，如虞世南、陈叔达、褚亮、杨师道、许敬宗、陈子良、李百药等人。这些人或为政治家，或为文学侍从之臣。由于生活圈子的狭窄和深受南朝诗风的影响，他们把那种风气也就自然带到了唐初：“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新唐书》卷二〇一）。从他们现存的诗歌来看，多半为应制奉和之作。为了满足帝王的需要，也为显示自己的才学，以诗歌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点缀升平，其内容无非是宴饮、游赏、咏物、艳情之类。这些诗歌辞藻繁富，描写纤巧细腻，但缺乏个性的流露与诗人的激情，因而也很难开拓出诗歌创作的新局面。深受太宗、高宗宠信的宫廷诗人上官仪，在当时最为有名。他的诗歌大都描写宫廷生活，且以“绮错婉媚为本”，实际上是宫体诗的延续。当时多有效其体者，时人谓之“上官体”。上官仪把六朝以来的对仗技巧加以程式化，提出“六对”、“八对”等名目，这成为后人属对的一种规范。

在隋至初唐前期的诗人中，王绩是一个例外。他鄙弃功名富贵，常以阮籍、陶渊明自比；他的诗歌也是以朴素的语言表现自己的生活和感情，自然而又真切，与当时诗坛上华靡艳丽的风气形成鲜明的对比。如他的《野望》：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不仅朴素无华，风格澹远，而且已经是成熟的五律了。但他在当时毕竟没有处在诗歌创作的主流之中，因而未能产生较大的影响。

高宗至武后初年，出现了“以文章齐名天下”的“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

邻、骆宾王。他们的社会地位都比较低下，但他们才华横溢，在唐诗的开创时期，肩负起了时代的使命，努力摆脱南朝浮靡诗风的影响，积极开拓诗歌的题材领域，对诗的格律形式也有新的探索。卢、骆的七言歌行，是在宫体诗的基础上创变出了新的情调，使得宫体诗由宫廷走到了市井，所以他们是宫体诗的改造者；五言律诗发展到王、杨才基本定型，并在他们手中从台阁移至了江山塞漠，所以他们是五言律诗的奠基人。“四杰”的诗歌创作除了开阔了生活的视野、扩大了诗歌题材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这便是他们的诗中开始出现了具有时代气息的昂扬的感情基调。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王勃的《滕王阁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杨炯的《从军行》、《骢马》等，就都是典型的代表。试举二例：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诗中一洗传统送别诗的哀怨悲伤的情调，乐观开朗而又豪爽壮阔，体现出时代的昂扬精神。杨炯的《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云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壮怀激烈而又昂扬奋发，表现出刚健豪壮的情怀，读来令人精神振奋。可见时代的那种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已经开始反映到诗歌中来了。可以说，“初唐四杰”代表了初唐诗歌革新与发展的方向。

刘希夷和张若虚也是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诗人，他们上承卢、骆发展了七言歌行。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虽然有悲叹韶光易逝的感伤情调，但诗人那华美而自然流畅的语言以及清丽婉转的风格，具有感人的艺术的魅力。如“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儿女惜颜色，行逢落花长叹息。今年落花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已见青松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一首被誉为“以孤篇压倒全唐”的千古绝唱。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诗人将游子思妇的离愁放在春江花月夜的背景上，以良辰美景衬托离愁之苦；又以永恒的江月来反衬人生的短暂，从而更加深了凄凉感伤的色彩。全诗高华明秀，色彩斑斓，细腻委婉，摇曳生姿，给人留下无限美好的遐想。武后时期的宫廷诗人沈佺期和宋之问，也是唐诗发展史中十分重要的诗人。他们的诗歌虽未能摆脱齐梁浮靡风气的影响，

但他们的一些优秀诗篇却也能反映自身的生活体验。而他们对诗歌最大的贡献，主要还是在形式格律方面。他们根据六朝以来诗人在形式格律方面的创作经验，把逐渐成熟的格律形式肯定下来，使律诗的形式得以定型。自此以后，近体诗和古体诗的界限有了更为明确的划分，这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形式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沈、宋同时的“文章四友”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在律诗的创作方面，亦不乏名篇佳作。

继“四杰”和沈、宋之后，在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表现出鲜明的革新倾向的诗人，是陈子昂。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一方面反对“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齐梁之诗，另一方面以“风雅”的精神和“汉魏风骨”的传统相号召，要求健康的内容与生动有力的语言形式相统一。他的诗歌创作，乃是其复古革新主张的具体实践。如他的代表作《感遇》诗三十八首，大都是有感于政事而发，其中心内容是抒发个人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和不能实现的慷慨不平。在精神传统上与阮籍的《咏怀》诗一脉相承。他的《登幽州台歌》也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佳作：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诗意深婉，形象突出，语言奔放，境界苍凉，一种内在的遒劲混茫之气夺人心魄。如此奔放的热情和浩大的气势，已经预示着盛唐诗歌的到来。

盛唐诗歌 从玄宗开元元年（713）到代宗大历元年（766），为盛唐。在短短的五十年间，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诗人，他们以各异的风采投入了诗歌创作的高潮。正如李白所说：“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古风》其一）开明的政治、繁荣的经济、强大的国力，促成了文化的全面繁荣，同时也使得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时代的氛围不仅开拓了诗人们的视野，陶冶了他们积极向上、乐观豪爽的性格，而且也滋长了冲破传统追求解放的精神。这一代诗人怀着宏伟的理想和抱负，以蓬勃热烈的感情、激昂慷慨的声音去讴歌那个时代种种激动人心的生活。那种追求进步的政治理想、为祖国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以及傲视王侯、反抗权贵的精神，乃是盛唐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盛唐诗歌的主流。“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王湾《次北固山下》），“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登鹳雀楼》）之积极乐观；“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李白《上李邕》），“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之昂扬奋发；“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王维《观猎》），“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之心雄万夫；“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高适《塞上》），“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四）之壮怀激烈；“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少年行》四首其二），“出门不顾后，报国死何难”（李白《幽州胡马客歌》）之慷慨豪侠，无不强烈地震撼着读者的心扉，充分体现出盛唐诗人豪宕不羁、雄心勃发的昂扬精神，这就是典型的盛唐时代的精神。正如严羽所说：“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答吴景仙书》）

盛唐诗人既有统一的慷慨豪放、昂扬爽朗的感情基调，又有各自不同的艺术追求与艺术风貌，从而充分展示出盛唐诗歌的多姿多彩。

王湾、贺知章、张旭、张说、张九龄等人，都是初盛唐之际的重要诗人。他们的诗

歌，往往在清澹简约的风格中透露出豪宕的壮怀，洋溢着一种洒脱自然之美。王湾的《次北固山下》：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诗歌虽写行旅中的乡情，却没有凄凉感伤的情调。阔大的气象之中，透露出新春的气息，也昭示着光明的未来。贺知章的《咏柳》也是一首春的赞歌：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咏柳而又不专意于咏柳，是这首诗的妙处。诗人借咏柳而歌颂了大好的春风，不仅构思新颖，比喻巧妙，而且意境清新自然，明朗高雅。那浓郁的春的气息，带着盎然的生机，也带着盛唐时代的精神，给人以向上的鼓舞和光明的展望，也给人以健康的艺术享受。张旭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他的草书与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时称“三绝”。然而他也善诗，工于七绝，多为描绘自然景物之作。如其为后人所称道的《桃花溪》、《山行留客》等诗，皆意境清雅，明快自然，具有洒脱之气。张说和张九龄都是开元名相。张说的诗除有大量的应制之作外，还有不少抒情言志和描绘山川景物的诗歌。尤其是他在遭贬期间的作品，朴实凄婉，真切动人。他的山水描写如：“云间东岭千重出，树里南湖一片明”（《涇湖山寺》）；“平湖一望上连天，林景千寻下洞泉”（《和尹从事憩泛洞庭》）；“山庭迢迢面长川，江树重重极远烟”（《同赵侍御望归舟》）等，工秀清新，景象壮观，显示出潇洒自如的诗笔。张说的七言歌行《邺都引》，则是一首慷慨悲壮、充满情韵的佳篇。张九龄的《感遇诗》十二首，与陈子昂的《感遇》很近似，也是兴讽托寓、感事抒怀之作。但张九龄的诗则更加思深力遒，风骨俊爽，给人以清澹简约之感。

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崔国辅、常建、丘为、裴迪等人的诗歌，往往在宁静秀美的意境中，蕴含着开阔、明朗和壮逸。孟浩然是一位终生隐逸却又始终不甘心于隐逸的诗人。他的诗歌以描写山水隐逸为主，其主要特点是在清淡自然的意境中，表现出淡淡的愁绪。如他的《春晓》、《宿建德江》、《宿桐庐江寄广陵旧友》、《晚泊浔阳望庐山》、《夜归鹿门歌》、《夏日南亭怀辛大》、《留别王维》等名作，就都是如此。他的《过故人庄》写农家生活：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平淡的语言蕴含着浓郁的情韵，诗歌的意境宁静优美而又纯朴自然。而他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一诗，写景则十分豪壮，如前四句：“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汪洋浩瀚、澎湃动荡之中，充满一种内在的活力。王维是一位有着多方面艺术才华的诗人。他精通音乐，擅长绘画，诗歌亦臻妙境。他的诗歌题材相当广阔，而主要成就体现在边塞诗和山水田园诗方面。其边塞诗如《少年行四首》、《出塞作》、《陇西行》、《燕支行》等，均充满豪壮的英雄气概；《陇头吟》、《老将行》等，则在豪壮的诗情之中，又带有深沉的忧思和慷慨不平之气；其《使至塞上》对边塞景物的描绘很有特色，尤其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两句，更是广为人所传诵。其《观猎》一诗，犹具盛唐雄豪之气：

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意气风发，激情洋溢，显示出苍茫浑厚而又遒劲有力的美学风貌。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构图精美，清新幽雅，具有宁静恬适之美。如《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于诗情画意之中寄托着诗人高洁的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诗中有画”，是王维这类诗的共同特点。其境界往往是空寂冷漠的，而画面之外，又往往寄托着一种孤独寂寞的情怀。如其《鸟鸣涧》、《竹里馆》、《鹿柴》、《山中》等名篇，无不如此。其《渭川田家》、《新晴野望》、《淇上田园即事》、《春中田园作》等诗，描写村景与田家生活，亦清新和谐，表现出安适自得的悠闲心境。王维的送别诗，写得清秀爽朗，韵味无穷。如《送元二使安西》、《送沈子福归江东》，清新自然的语言之中，蕴含着真挚深厚的惜别之情。储光羲的诗，以描写田园生活最为突出。如《田家杂兴》八首、《田家即事》、《采莲词》等诗，皆闲婉真切，清新朴素，既表现了田园生活的恬静淳朴，也表现出诗人闲雅的逸兴。崔国辅的乐府短章如《怨词二首》、《湖南曲》、《小长干曲》、《古意》等，皆清新明快，颇有江南民歌的风味。常建的山水田园诗，灵慧雅秀，清妙自然。如其名作《题破山寺后禅院》：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寺，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

意境空灵静谧，一片清机。他的边塞诗气格清劲，颇有悲怨凄楚之调，在盛唐时代亦别具一格。丘为的诗歌亦多咏田园风物，如其《题农父田舍》、《泛若耶溪》等诗，皆清新自然而韵味浓厚。裴迪长于五绝，善描绘山水田园的幽寂景色，以《华子冈》、《宫槐陌》等诗为佳，笔调质朴淡雅，有王维之风。

崔颢、李颀、王昌龄、王之涣、祖咏、崔曙等人的诗歌，具有清刚俊爽之美，其浓烈的情思之中所蕴含的骨气，乃是盛唐时代昂扬精神的体现。崔颢最著名的诗作是被誉为唐人七律第一的《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将眼前浩淼凄清之景同怀古思乡的情绪相融合，显得自然高妙而神韵超然。李颀的诗歌题材内容较为丰富，艺术风格既有豪放洒脱的一面，又有清丽秀美的一面。他的送别赠答之诗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如《送崔侍御赴京》、《别梁锜》、《少室雪晴送王宁》、《赠别高三十五》、《送魏万之京》等作品，无不清新爽朗，慷慨壮大，神采飞扬，感情真挚，而以后者最为出色。李颀的边塞诗和描写音乐的诗歌也有其独特的风貌。特的风貌。王之涣的《凉州词二首》其一：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苍茫辽阔，气象雄浑，风骨爽朗。此外象祖咏的《望蓟门》、崔曙的《九日登望仙台呈刘明府容》等作品，亦甚有名。王昌龄的诗以七绝最佳。他的边塞诗如《从军行》七首、《塞下曲》四首等，都是著名的篇章，其中所表现的爱国豪情和勇敢乐观的精神，

都是典型的盛唐之音。然其诗中亦不乏描写战士们的不幸与乡愁。如《出塞》二首之一：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境界阔大，情思浓烈，颇有慷慨悲壮之气。王昌龄表现闺怨、宫怨的诗和送别诗亦绝佳，前者以《闺怨》、《长信秋词五首》其三为代表，后者以《送魏二》、《芙蓉楼送辛渐》为代表。

高适和岑参的诗歌，更是雄浑壮美的典型。尤其是他们的边塞之作，堪称盛唐诗人的代表。高适的作品内容丰富，思想深刻，雄豪之中透露出悲壮的甚至复杂的情思，给人以博大厚重之感。他的《燕歌行》就是这类诗中的代表，同时也是盛唐边塞诗中最优秀的篇章之一。诗云：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气氛悲壮淋漓，诗意含蓄深刻，笔力矫健畅达，境界雄浑深远。岑参的诗虽不如高适的诗思想深刻，但内容十分丰富，而尤善于以浓重的诗笔描绘西北边塞所特有的奇异景象，以及将士英勇报国、不畏艰苦的精神。如其《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等，皆为杰作。先看前一首：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鲜明独特而又朗畅壮美的意境之中，充满浪漫奇妙的色彩，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再看后一首：

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茫茫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行军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血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诗中高扬边防将士斗风傲雪、不畏艰险的战斗豪情和爱国精神，诗情慷慨激越、流宕豪壮，具有激励和鼓舞人心的特殊魅力。

李白的诗歌，更是奇妙地凝聚着盛唐诗歌的风貌，他的追求是兼有豪壮雄浑与清新明秀二者之美。他那奔放的热情、浪漫的理想、执著的追求、坦荡的胸怀、不羁的性格，以及豪侠式的行为，都可以说是典型的盛唐式的。时代的精神风貌和他个人的性格、气质，反映在他的诗中，从而形成豪壮雄浑与清新明秀之美，构成他所特有的飘逸